

【学界往事】

□吕家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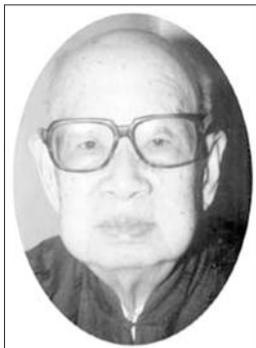
我对杨向奎先生最突出的印象是:他总是出人意料。见闻中杨先生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想不到的。

解放初期,学校里的政治空气非常高涨,人们都显得风风火火,而杨先生却总是那么神态安详,步履从容。记得他的衣着也很讲究,经常呢服革履,似乎从来没有穿过干部服。他开的课主要是中国上古史,多次在走廊听到他从课堂里传出的高亢清朗的声音:“天命玄鸟,降而生商哎——”因此,我认定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学究,不但和革命干部不沾边,和“进步教授”也相距甚远。不料,在1950年就听说杨先生被吸收为共产党员,那大概是山大在解放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。这让我大感意外,于是去打听杨先生的光荣革命历程,原来他早就在地下党的领导参加地下斗争了。

我没到杨先生家里去过,在我这个少年郎的心目中,总把他想象成一位在家里道貌岸然地管教子女的家长。可是有一天忽然听说:杨先生结婚了,新婚的师母是一位中学教师。这也让我大感意外。接着听说杨先生曾经有一段父母包办的婚姻经历,后来解除了婚约;又隐隐听说他曾和一位活跃的女大学生闹过一段曲折的罗曼史,最终双方友好地分手。此中曲折更是我这个农家孩子无法想象的。

大概在大学二年级上学期,孙昌熙先生教我们写作实习,几周以后,同学们不满意他的讲课,要求撤换老师。有一天,杨先生以文史系系主任的身份和我们三个学生代表谈话。他让我们畅所欲言地谈出了不满的地方,又问我们希望老师怎样教课,我们没有什么准备,只是笼统地说:希望老师能够讲出东西来,能够对我们的写作确实有帮助。他又问我们希

杨向奎先生



杨向奎先生

望换哪位老师来教,我们也提不出来。杨先生说:你们对教学的意见和要求,系里一定转告孙先生,你们也可以直接给孙先生提,我相信孙先生有能力教好这门课。接着他拿出一些事先准备的材料给我们看,都是孙先生在著名刊物上发表的散文、小说和论文。他说:孙昌熙先生是三十年代北京大学(抗战后并入西南联大)中文系的高材生,在大学时代就发表了一些散文、小说,受到朱自清先生的赞赏,毕业后就留校做朱自清的助教。这样有创作经验的老师教你们写作实习,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!孙先生不愿吹嘘“当年勇”,不是正说明他的谦虚吗?最后杨先生说:人都有缺点,每个老师的教学也难免有缺点,学生应当帮助老师改正缺点,提高教学,这才符合党的要求,是不是?哪能动不动就要求撤换老师呢?杨先生始终和颜悦色,让我们口服心服,深受教育,为自己的幼稚、轻率感到惭愧。我们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杨先生循循善诱的水平这么高是我们预想不到的,杨先生为这次谈话做了这么充分的准备,也是我们预想不到的。此后,孙昌熙先生的讲课果然渐入佳境,他和同学们之间

逐渐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。

一别数十年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后期,在批判林彪时,听说杨向奎先生受到了牵连,被隔离审查了,据说林彪1966年5月的那个讲政变的报告(曾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),其中的一些历史材料就是让杨先生搜集提供的。我想:杨先生于1956年离开山大调入中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(后来属于中国社科院),一直在研究古代史,怎么会卷进这么高层的政治斗争漩涡呢?这实在大出我的意料。

1988年6月3日,听说杨先生回到山大小住,很想和一些“老学生”聚谈,我随朱其凯学长一同奔赴山大的指定会场。会场是在一个不大的办公室,在座的都是校友。78岁高龄的杨先生显得健旺硬朗、慈祥愉悦,他兴之所至地向学子们倾吐肺腑之言,使会场洋溢着亲人间久别重逢般的温馨又亲切的气氛。他谈治史、谈人生,当然也谈到如何受到了“林彪问题”的牵连。他和林彪的关系有两段,都是组织上交给他任务。第一段是在1966年春天,他曾经给林彪的儿子老虎(即林立果)做了一段时间家庭教师。第二段是在1970年,他给林彪、叶群讲中国哲学史。起因是,毛主席在中央开会发言时,喜欢讲一些典故,他们听了不知道怎么回事,包含什么意思,希望杨先生能够发挥咨询作用。杨先生是党员,组织上交给他任务无可推辞。1971年9月林彪出事后,他被反复审查也没有查出他和林彪集团的任何政治联系,但还是把他关进秦城监狱4年多,直到打倒“四人帮”后才出狱……这些话都是我很感兴趣的,也是我可以预想到的。想不到的是,这位我心目中的古代史学者,竟还不厌其烦地大谈他对理论物理学的研

究以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订正。他说:在秦城监狱,因为时事、政治类的书刊不准看,就利用蹲监狱的时间学英语,又读了一些最新出版的物理书。他下工夫对相对论做了切实深入的研究,觉得爱因斯坦的有些看法站不住脚,于是写了几篇论文和爱因斯坦商榷,请军宣队转给北大或中国科学院。出狱以后,他自费出版了两本和相对论有关的书,一本是《论时间、空间》,一本是《熵和引力》。1981年他被派赴美国访问研究一年,临行前请人翻译了一本带去,寄给美国的一个刊物。这家刊物编辑部回信说准备发表,可是左等右等也没有动静,再去信催问,答复说:我们是个小刊物,不敢发表您这样的大文章。后来就无声无息了。

杨先生是诚朴谦逊的,他说:“我不过是个中等之才,在外语上只是下等之才,有点成绩完全是靠努力苦干得来的。”杨先生又是非常自负甚至近乎狂妄的,他说:“我总认为自己的著作都是正确的,绝对正确的,不然我何必写呢?”“我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什么?现在看来是在历史研究方面,也许若干年后,我对相对论的研究才会得到承认,那方面的贡献会大大超过我在历史研究上的成果。”他还得意地说:我可以开一门京剧研究课,这不是瞎吹。有一年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,主持人对我的介绍,第一是京剧评论家,第二是体育运动评论家,第三是物理学家,第四才是历史学家。年近八十高龄的杨先生竟像小孩子那样真诚坦率,毫不掩饰地把谦逊和自负融为一体,集于一身,这又一次让我感到大出意料,惊诧莫名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195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)

万圣节前夕,我在美国住的海德公园社区,家家门前都早早地摆上了南瓜。各家有各家的风格,那南瓜摆得都非常有意思,有的从路边一直摆到门前,像仪仗队欢迎客人似的;有的在每个台阶前放一个南瓜,步步登高;有的左右对称;有的则在南瓜上雕刻上笑脸,做成南瓜灯,迫不及待在迎接节日的到来。

在我看来,世界上许多节日都日渐失去了民俗的本意,而成了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。万圣节,在美国更成了孩子们的节日。因为这一天,孩子们可以兴致勃勃地敲响各家的房门,向那些平常并不熟悉甚至根本不认识的邻居们讨要糖吃。而各家都准备好了各色糖果,等待孩子们的到来,一起创造并分享这种欢乐。各家门前的这些南瓜,就像圣诞节的圣诞树,是节日的象征,只不过圣诞树一般是放在家中,南瓜则是放在屋外的。于是,南瓜便也就有了节日共享的意味,颇有些像我们春节的花炮,燃放起来,大家都可以看到,共同欢乐。

【人生随想】

万圣节的南瓜

□肖复兴

那一色黄中透红的南瓜,在万圣节前夕,是那样明亮,给已经有些寒意的初冬天气带来暖意。

唯独有一家人家的房前,没有放一个南瓜。在整个社区显得格外醒目。仿佛一串明亮的珠子,突然在这里断了线,珠子串不起来了。

每天散步,路过这家门前时,我的心里都有些怅然。这是一座很大的房子,门前有拱形的院落和左右对称的院门,院门旁各有一株高高的海棠树,连接这两座门的是座半圆形的花坛。看院子这样气派的样子,这应该是一户殷实人家,大概不会买不起几个南瓜,在超市里三个大南瓜只要十美金。要不就是因为忙,一时顾不过来去超市买南瓜?

又几天过去了,马上就万圣节了,这家门前还是没有放一个南瓜。门前的樱桃桃树结满红红的小果子,花坛却没有一朵花在开放了,秋风一吹,院落里落满凄清的树叶,也没有打扫。我有些奇怪,便向人打听,这是怎么回事呢?这样的情景和节日大不相吻合,和这样气派的房子也不大吻合。

有人告诉我,这家的主人是位医生,不知犯了什么案,被判了刑,关进监狱,这座房子被银行收走,他的家人只有在这里住一年的权限。我从来没见过这家的女主人,只见过他家有两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出入,年龄都不大,两个男孩子像是中学生,妹妹小,大约只上小学。心里也就多少明白了,家里缺少了主心骨,大人孩子过日子的心气也就没有了,再好的房子和院子也就荒芜了。况且,缺少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,三个正上学的孩子都需要花销,日子过得局促,自然顾不上南瓜了。心里不仅替这家人惋惜,尤其是替那三个无辜的孩子难过,大人们做事情的时候,往往忽略了孩子的存在。但凡想自己的好孩子,做事情的时候也该会让自己手颤抖一下吧。

那天下午,我的邻居家的后院里忽然响起了锄草机的轰鸣声。这让我很奇怪,因为邻居锄草很有规律,都是在周末休息的时候,怎么还没有到周末,而且人也没有下班,就有了锄草的声响呢?我走到露台上去看,发现是那家医生的两个男孩子在锄草。他们开来一辆汽车,停在院子前,我猜想是他们拉来了自己的锄草机,帮助邻居锄草,挣一点儿辛苦钱。同时,也猜想是邻居好心,让这两个孩子挣点钱去买万圣节的糖果和南瓜。

我的猜想没有错。黄昏时候,邻居下班,我问了他们。这是一家印度人,他们腼腆地笑笑,证实了我的猜测。同时,他们还告诉我,这个社区里很多人都知道他们家的事情,都像他家一样将锄草的活儿交给了这两个读中学的孩子。他们不愿意以施舍的姿态帮助他们,那样会伤孩子的自尊心,他们更愿意以这样的方式帮助孩子,让他们感觉自己像成人一样可以自食其力,可以为家庭分忧,给母亲和小妹妹一点安慰。

果然,第二天,这家医生的门前摆上了南瓜。是三个硕大无比的大南瓜,大概是三个孩子每人挑选了一个中意的南瓜。每个南瓜上都雕刻上了笑脸,在布卢明顿明亮阳光的照耀下,那三张笑脸笑得非常灿烂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)

【解放之初记事系列之一】

□王学泰

1949年初,北平解放了,解放军进城了。关于解放军有许多传言,比如有人说,共产党是讲平等的,有个穿翻毛大衣的女人坐洋车被大兵拦截了,大兵命令女人下车,让车夫坐上去,命令女人拉他。不管这事是真是假,但传得很厉害,家里再不敢让我坐洋车上。实际上,家里经济状况也请不起车夫了。从1947年起,通货膨胀如断线的风筝,扶摇直上。1948年,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,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,物价上涨3492万倍,那时的纸币如同废纸,几乎没人要,可是机关、学校发薪还是纸币。一个月的薪水要用麻袋装,用洋车运回家。纸币到了手还得赶紧花,物价一天三涨,早晨能买一袋面的钱,到中午也许只能买几个馒头了,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
父亲的买卖也在走下坡路,他本来是个手工工人,因为地毯厂关门才余下些钱去做买卖,根本不懂商业经营,干什么都赔,而且赔得一塌糊涂。他开个烟卷公司生产“维纳斯”牌香烟,烟盒很漂亮,但香烟质量极差,烟客称为“三勤烟”——勤点,勤吸,勤灭。这个公司地址就在和平门内的顺城街,设施还不错,有工人上班时专用的澡堂子,我还

家的败落与转学

去洗过澡,然而产品卖不出去,不到一年就倒闭了,洗澡池一度用来洗地毯。娱乐业更不景气,兵荒马乱,人们吃饭都发愁,谁还娱乐?紫竹林也渐渐偃旗息鼓,无疾而终了。最后只留下南城南横街的一间小茶叶铺还勉强支撑,但要靠它来养活全家,那是绝无可能的。

面对抽风一样的经济,北平人也有对策。不同收入的北平人约可分为四等:最有钱而且有门路的,存美金、倒腾外汇;次一等存黄金和现大洋,既可倒卖,也能保值;三等存物资,既能用,也有升值期待;四等人勉强靠纸币维持,这些人最苦。当然,没有收入的乞丐,冬天来了,便沦为街头的“倒卧”(北平人称饿死街头的人)。我们家可能勉强算三等,有点钱就赶紧买东西、存东西,什么都买,以食品为主,比如“洋面”(北平人称面粉为洋面,因为用面袋包装,零售面粉的方法是洋人引进的,中国当年最流行的品牌面粉是“冰船”、“骆驼”)、大米、食油、肥皂、“洋火”(即火柴)、香烟、煤油等等。最初只是害怕囤城像长春那样围个一年半载,没吃没喝,后来随着通胀也变成牟利的手段。整个北平到处是自发的“黑市”,只要有空地的街衢都变成了

“晓市”,一进“晓市”就可以听到袖筒内的银元撞击声和“买两块,卖两块”的低语(私下买卖金银非法,所以不敢张扬),父亲就常到宣武门内的“晓市”去“赔钱”,最后连自住的小房也考虑出售了。自1949年春起,即使没有不许坐人力车的传言,我也要走着上学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又赶上我五叔肺病告危,他住在中央医院(现在的北京人民医院),除了常规治疗外,还要注射链霉素。据说链霉素是德国货,解放军正在围城,药物进不来,链霉素卖到一两黄金一支。五叔从老家来到北平后,一直跟着我父亲,连老婆都是我父亲帮他娶的。他病了自然是我父亲出钱给他医治。肺结核民间称为痨病,那时谈痨色变,比现在的癌症还可怕。五叔的病是压断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我作为小学生第一次与“解放”、“新政权”发生关系是买像章。解放军进城没几天,我们开学了。路过和平门时发现有个老人卖新奇的小物件,我走近一看,是一个个样式新颖的像章,其中有一款长方形的,外用化学(当时称塑料制品)膜覆盖,内中有朱总司令与毛主席并排画像(那时在国统区是“朱毛”并称),50元一

枚,用新兑换的人民币购买。当时的50元相当于五十年代币制改革后的5厘。我把它别在胸前,作为进入新社会的标志。

解放后,家中债务丛集,医院正在转制,天天逼着还账,我们的小院只好卖掉了。改朝换代之际,一切都在不确定之中,此时除了食品之外都不值钱。这个有八九间房的小院只卖了80匹布色五幅白布(人们不相信纸币,交易大多以货易货),如果折合现今的人民币只有两三万元。

我们只好搬家了。离新家最近的当属“八区中心小学”,这是一所公立学校,很难进,学期中间插班更是不可能的。恰巧我们有个亲戚在一个教会小学教书,名铸新小学,是私立学校,可以收插班生。但学费较贵,按月收费,一年8个月,每月一袋面。学杂费相当于公立学校五倍,出于无奈,我只得去了铸新小学。

现在我用百度搜索“铸新小学”,没有任何条文显示,这个小学完全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,但它在我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学者,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,著有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》等)